

应注意对我国相对贫困层的研究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Research on Relative Poverty

李 强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副主任, 副教授)

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是关于贫困问题研究中常使用的两个基本概念与基本指标。所谓绝对贫困是就社会上人们的绝对生活水准而言的, 即用纯粹客观的物质指标去测量贫困, 因而我们可以把它定义为: 低于最低的物质生活水准的一种生活状况。所谓相对贫困是指相对于社会上其他部分的人的生活水平, 有一部分人处于社会生活水准的最下层。因而相对贫困测量的是财富或收入在不同社会阶层、社会群体之间的分配的问题。

一、我国目前绝对贫困测量中存在的问题

目前, 我国研究人员对国内贫困人口所做的研究与测量基本上是属于绝对贫困人口的研究。我国政府所提出的贫困指标也大体上是一种绝对贫困指标。1984年, 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研室最先提出了我国农村的贫困线: 集中连片的最贫困乡的标准是人均年收入人民币120元以下, 人均口粮南方水稻产区200公斤以下, 北方杂粮产区150公斤以下。这确实是一种很低水平的纯客观的贫困标准。1985年以后, 我国农村人口的贫困标准, 大体上定在两条线上, 即人均年纯收入150元以下为赤贫户, 人均年收入200元以下为贫困户。按照这个标准测量, 1986年5月, 我国农村人均年纯收入200元以下的贫困户人口有1.02亿人, 占当时农村总人口的12.2%, 而人均150元以下的赤贫户有3 643万人, 占农村总人口的4.36%。按上述贫困线测量的中国农村贫困与赤贫人口比例, 在整个80年代中有很大幅度的下降。人均收入150元以下的农村人口由1980年的占34.5%下降到1990年的仅占1.39%, 人均收入200元以下的农村人口由1980年的占61.6%的高比例下降到1990年的仅占3.59%。(见表1)。对于表中所显示的变化, 人们一般称之为: 我国大多数贫困地区的人民已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

表1 中国农民低收入家庭的比例分布与变迁 单位: %

年代 % 人均 年纯收入分组	1980	1985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100元以下	9.8	0.96	1.14	0.87	0.51	0.57	0.45
100~150元	24.7	3.40	3.17	2.38	1.49	1.25	0.94
150~200元	27.1	7.86	7.02	4.99	3.34	2.76	2.20
200~300元	25.3	25.61	21.82	17.51	13.51	10.89	9.49

①根据国家统计局所作的农村住户抽样调查资料, 参见《中国统计年鉴》1991年。

我国贫困线以下人口比例的迅速下降, 首先当然应归因于1979年以来经济的迅速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然而, 另一方面, 也不应忽视我国绝对贫困测量中所存在的问题, 即这种测量尚有不准确之处, 以及与现实有所脱节的问题。例如, 前述的统计是按当年价格计算的, 未能消除价格变动所造成的影响, 因而并不能准确反映实际收入水平。不过, 即使解决了这些技术问题, 我国的绝对贫困测量也仍有重大不足, 最为突出的是, 它未能真实反映出我国贫困人口现状。

按照前述的绝对贫困指标, 到1990、1991年, 我国贫困人口所占比例已经很小, 几乎是微乎其微了。这种低比例与我国的经济水平尚不很高、人民生活尚不很富裕的现实并不相符。特别是在做国际比较时, 我国贫困线指标过低的问题就更为突出。按照目前的国际标准, 赤贫贫困线为年人均收入275美元(按1985年购买力平价美元计

算,下同),穷人贫困线为年人均收入370美元。显而易见,我国目前实行的绝对贫困线,与国际标准相比,差距是很大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仅根据我国目前较低标准的贫困线,就过早地宣布我国已基本解决了贫困人口问题,这种做法十分不妥。同样,在国际比较中笔者也发现,我国所测算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比一些经济发达国家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还要低很多,这也从一个侧面暴露出我国贫困标准不妥之处。当然,笔者也并不主张目前就按国际标准确定我国的绝对贫困线,那样做肯定会将贫困线定得过高,包括的贫困人口基数过大,这也不符合我国的实际。那么,怎样解决我国目前贫困测量中的这个困难问题呢?笔者认为,应引入相对贫困研究作为补充,制定我国的相对贫困指标和相对贫困线。

二、应用相对贫困线测量我国的贫困人口

如前所述,相对贫困指的是与同一社会内其他成员相比较而言的一部分人的低下生活水平。参照国际上的相对贫困标准,可以将我国的相对贫困标准定义为:不足社会成员平均收入的50%。具体操作也十分简便易行。首先算出平均收入水平,然后以平均收入的半数为标准,测量这一标准以下的人口数量和比例。

由于我国城市与农村二元结构比较突出,对城市与农村的相对贫困以做分别测量为宜。下面试以1990年的数据为例,对我国城市与农村的相对贫困做一粗略估算。

先看看农村。1990年,中国农民家庭人均年纯收入为629.79元,半数为314.90元。从前面表1可以看出,1990年农民家庭人均收入100元以下、100~150元、150~200元、200~300元几组人口所占百分比分别为0.45%、0.94%、2.20%和9.49%,合计共占农民总人口的13.53%。这个数字已十分接近于我国农村相对贫困人口比例了。当然,由于相对贫困线314.90元比300元的分组指标还略高一些,所以,实际的相对贫困人口比例也比13.53%略高一些。

再看看城市中的相对贫困。1990年,中国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全部生活费收入为1387.27元,平均每月为115.60元,半数为57.80元。这就是按月计算的相对贫困线。据统计,1990年我国城镇居民家庭月人均收入60元以下的占7.38%,由于没有更接近的数据,暂且可以将这个百分比视为我国城镇居民相对贫困人口所占比例的大约值。

上述两个百分比,应该说大体上符合我国城乡贫困人口现状。

相对贫困的另一种测量方法是人口及收入的五等份测量法,按人均收入高低,将人口分为五等份,然后测量各1/5层的收入在总收入中的比例。

试以中国1989年的数据为例,展示一下中国农村与城镇的人口五等份收入比例,见表2与表3。

表2 中国农民家庭按五等份法测量的各层收入占有的比例

按人均家庭收入分组	占全国农家收入比例(%)
最低的1/5	7.63
次低的1/5	12.76
中间的1/5	16.29
次高的1/5	22.84
最高的1/5	39.56

表3 中国城镇居民家庭按五等份法测量的各层占有收入比例

按人均家庭收入分组	占全国城镇居民总收入比例(%)
最低的1/5	11.65
次低的1/5	15.73
中间的1/5	19.27
次高的1/5	23.68
最高的1/5	29.38

五等份法主要反映的是总收入在各阶层中的分布情况。从表2、表3的数据看,中国农村的贫困层与富裕层的差距比城市中的要大。中国农民最高收入的1/5层占有全国农家收入的39.56%,而最低的1/5层仅占7.63%。相比之下,中国城镇居民最高收入层与最低收入层占有收入的差距则要小些,分别为29.38%和11.65%。如果从国际比较的角度看,中国的贫富收入差距,无论在城市还是在农村都还不算很高。例如,美国80年代初的调查显示,最高的1/5占有总收入的41.6%,而最低的1/5仅占有总收入的5.1%,而且,进入90年代以来,美国的这种差距又有所扩大。

三、采用相对贫困线测量方法的优点

采用相对贫困线研究我国目前的贫困人口具有如下的优点或意义。

第一,它有助于标定适度的贫困标准。在制定贫困线标准时,关键的问题是要适度,既不能太高,也不能太低。指标过高、贫困人口过多,任何政

(下转第40页)

受到束缚,上级颐指气使,管理水平也难以提高。长此以往,还会形成复杂的“关系网”,滋生出许多弊端。而合理的自由流动,则能形成上级选择下级,同时下级也选择上级的良性互动局面。在双向选择的过程中,既能促进职工的进取精神,又能促进领导者提高管理水平,而且从根本上铲除掉人身依附关系。这将会给我国的社会进步带来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其次,它有助于培养人们的全局观念。劳动者长期局限于一个岗位上或一个单位内,容易使人产生本位主义思想,一切以“我”、“我们”为出发点,坐井观天,缺乏全局观念,而且缺乏对他人的理解、体谅和与他人进行合作的精神。如果能形成自由的合理的流动,多数人都能有在不同地区、不同单位、不同岗位工作的经历,就能使人们更好地认识自己,更好地认识他人,树立良好的全局观和整体观,培养理解和合作精神。同时,由于不断的流动,使每个单位都能有来自不同地区、不同单位的成员,从而发挥人员结构上的“杂交”优势,提高工作效率。

所有这些都表明,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对我国社会的发展是十分重要的。

总之,尽快放开对人口(劳动力)流动的种种限制,不仅是十分重要的,而且是十分必要的。

当然,11亿人的流动,难免让人担心。从政治上,担心天下大乱;从经济出发,害怕宏观失控,无人事农,无人建设边疆,担心大批农村人口涌入城市给城市造成生活、生产方面的巨大压力;从行政管理看,担心劳动者说走就走,无法领导;此外,还有人担心人口流动会带来计划生育的失控。

的确,11亿人的流动,将使社会生产、生活及管理变得更为复杂,上述担心也不无道理。但是,在庞大的洪流面前,是“堵”还是“疏”,这是一个原则问题。如果只有“流”才有活力,那么即使有困难,有担忧,也要“促其流,促其活”。从政治上,社会主义绝不能把人的个性自由发展视为异端,相反,只能为之创造条件,提供保障,因为社会主义正是把“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共产主义理想作为自己追求目标的。同时,也只有当人们在自由的流动中获得了更大的个人实现以后,他们才会更深刻地领会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从而更主动更自觉地为维护社会主义制度而努力。从经济上看,这种担心更没有必要。只要存在商品经济,中国的农民就不会统统进城,价值规律的作用会实现人口城乡分布和区域分布的最优选择方案。从行政管理方面看,“双向选择”的用人制度只会暴露无能、促人奋进。靠捆绑留人的制度,造就的是专制和蛮横。只进不出,又培养了平庸。唯有“双向选择”,才是对人才、知

识和民主的真正追求。因此,自由流动无论对培养更高水平的干部队伍,还是对造就更高水平的职工队伍都是大有裨益的。最后,关于计划生育,不可否认,确实有一部分人为达到超生的目的而流动。但是,大多数人流动的目的不在此。大量研究证明,流动人口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和改善人民生活条件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且,从总体上讲,流动有助于降低人们的生育水平。中国人口的成功控制,绝不能寄希望于对人口流动的禁锢,而正好相反,它有赖于人口的合理而自由的流动。至于如何对付极少数以超生为目的而流动的人,则主要是一个管理问题。(责任编辑 蔡德诚)

(上接第10页)

府都无能力解决这样的贫困问题。指标过低,贫困人口微乎其微,等于无视贫困问题。而相对贫困标准则能较好地解决这个问题。相对贫困测量的是要在相比较的意义上,弄清人口中处于收入底层的那部分人的比例,在正常情况下,这部分人的比例既不会太高也不会消失。

第二、采用相对贫困的指标,也可以较好地解决前述的在贫困测量中,我国绝对贫困指标过低而国际指标过高之间的矛盾。由于相对贫困所要确定的是一个相对的最低收入层,并不注重于寻找纯粹客观指标。从这个角度看,各国尽管经济发展水平不同,但都会有不同比例的一部分人居于收入的最下层。这样,高收入国家与低收入国家就找到了可以通用的测量低收入群体比例的指标。

第三、相对贫困研究的是财产、收入在社会贫富阶层之间的分配,这可以使我们从分配的角度考察贫困问题。我国公众历来对这个问题比较重视。目前,分配不公的问题已成为我国人民群众关注的一个焦点,要求解决这个问题的呼声甚高。而研究相对贫困则有助于解决这方面的问题。

第四、采用相对贫困指标,有助于我们将治理贫困作为一项长期战略任务去完成。从国际比较看,我国经济发展水平还不高,治理贫困应是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如果依据我国目前的绝对贫困线,现在就宣布我国已基本上消灭了贫困人口,这既不稳妥,也不符合事实。当然,我们也可以不断修正和提高绝对贫困线指标来解决这个问题。然而,提高贫困线指标的作法本身就已经意味着,承认贫困是相对的。相对贫困测量的是相比较意义上的底层,它已经将经济总体水平的变化包含在内了。按相对贫困测量,不管经济怎样发展,总有一部分人口处于贫困状态。这种测量对于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具有重要意义。它使我们在治理贫困上不断提出新的目标,不断研究如何在更高水平上解决贫困问题。(责任编辑 蔡德诚)